



中俄文化交流史

清代民国卷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肖玉秋 主编

肖玉秋 阎国栋 陈金鹏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俄文化交流史

清代民国卷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肖玉秋 主编

肖玉秋 阎国栋 陈金鹏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文化交流史. 清代民国卷 / 肖玉秋主编; 肖玉秋, 阎国栋, 陈金鹏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12(2018.5 重印)
ISBN 978-7-201-11214-5

I. ①中… II. ①肖… ②阎… ③陈… III. ①中俄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清代②中俄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民国 IV. ①K203②K5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9482 号

中俄文化交流史 清代民国卷

ZHONG-E WENHUA JIAOLIU SHI QINGDAI MINGUO JUAN

肖玉秋 主编 肖玉秋 阎国栋 陈金鹏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项目策划 沈会祥
责任编辑 刘子伯 陈 烨 赵 艺
装帧设计  王 烨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5.75
插 页 6
字 数 66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17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07JJD770105）成果
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目 录

清代篇

第一章 中俄文化交流的起源	003
第一节 中俄之间的最初接触	003
第二节 蒙古民族的中介作用	005
第二章 早期俄使来华的文化意义	012
第一节 早期俄国来华使节	012
第二节 俄国使节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018
第三节 中俄外交礼仪之争	036
第三章 18 世纪俄国的“中国风”	041
第一节 欧洲中国题材著作在俄国	041
第二节 俄国皇家宫殿园林的中国风格	047
第三节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的学术联系	049
第四节 俄国文化精英的中国文化观	053
第四章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	068
第一节 俄国东正教传入北京	068
第二节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文化功能	076
第五章 中俄宗教交流	087
第一节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	087
第二节 中国宗教在俄国	120
第六章 中俄语言交流	133
第一节 中国的俄语教育	133

第二节 俄国的汉语教育	160
第七章 中俄教育交流	179
第一节 俄国来华留学生	179
第二节 中国人留学俄国	190
第三节 俄罗斯文馆的俄人教习	205
第四节 圣彼得堡大学的中国教习	210
第八章 中俄图书交流	218
第一节 康雍乾时期的图书交流	218
第二节 道光年间的中俄图书互赠	226
第三节 俄国的汉籍收藏机构	231
第九章 中俄美术交流	251
第一节 俄国美术在中国	251
第二节 俄国对中国美术的认识	257
第三节 中国木版年画在俄国	260
第十章 中俄医学交流	276
第一节 俄国医生来华	276
第二节 中国医学在俄国	281
第十一章 俄国汉学	296
第一节 俄国汉学的发端	297
第二节 俄国汉学的崛起	305
第三节 俄国汉学的发展	309
第十二章 中国人旅俄行纪中的俄国文化	318
第一节 图理琛及其《异域录》	318
第二节 张德彝及其《航海述奇》和《四述奇》	323
第三节 缪祐孙及其《俄游汇编》	330
第四节 王之春及其《使俄草》	332
第五节 戴鸿慈及其《出使九国日记》	335
第六节 张庆桐及其《俄游述感》	338

民国篇

第十三章	马列主义从苏联到中国的早期传播	351
第一节	毛泽东与马列主义	351
第二节	李大钊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354
第三节	瞿秋白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357
第四节	鲁迅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363
第五节	周扬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367
第六节	苏联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72
第十四章	中苏文学交流	376
第一节	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者	376
第二节	俄苏经典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391
第十五章	中苏艺术交流	403
第一节	中苏美术交流	403
第二节	中苏电影交流	410
第三节	中苏戏剧交流	418
第四节	中苏音乐交流	425
第十六章	中国的俄语教学	430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下的俄语教学	430
第二节	共产党领导下的俄语教学	437
第十七章	中苏教育交流	445
第一节	苏联的中国留学生	445
第二节	中国大学里的俄苏教师	453
第十八章	中国文化名人访苏	464
第一节	瞿秋白访苏	464
第二节	徐志摩访苏	465
第三节	胡适访苏	468
第四节	胡愈之访苏	468
第五节	戈公振访苏	472
第六节	邹韬奋访苏	474

第七节	郭沫若访苏	478
第八节	华罗庚访苏	482
第九节	茅盾访苏	485
第十九章	民国时期的苏联汉学	489
第一节	阿理克与苏联汉学	489
第二节	苏联汉学的主要成就	498
第二十章	中苏文化交流机构	504
第一节	中苏文化协会	504
第二节	时代出版社	509
第三节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518
主要参考文献		523
主要人名索引		540
后记		563

清代篇

第一章 中俄文化交流的起源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立国时间很晚,直到 862 年(中国唐懿宗咸通三年)才建立了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关于中俄两国开始交往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元代,这一时期,中国文献中已有关于俄罗斯兵士被俘来华并驻守北京的记载。到了明代末年,为探听中国的消息并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俄国政府多次派人前往生活在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及叶尼塞河流域的蒙古部落活动。可以说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蒙古民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一节 中俄之间的最初接触

13 世纪蒙古大军西征,罗斯人死伤无数,蒙古人俘获无算。一部分被俘罗斯军士被调遣至作为蒙古帝国一部分的中国,编入扈卫亲军。到元朝灭亡时,生活在中国的罗斯人或被同化,或随蒙古人西去北上,于是在明代的典籍中便没有了他们的踪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史专家阿多拉茨基(Н. Адоратский, 1849—1896)甚至推断这些人的后代最后去了四川。^①《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和《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载:“辛未,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立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营于大都北,市民田百三十余顷赐之。”“宣忠扈卫斡罗思屯田,给牛、种、农具。”“甲寅,改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诸指挥使司,赐银印。”此外,《元史》还有三处记载了诸王向朝廷献斡罗思人口的情况,总计达数千人。除“斡罗思”外,俄罗

^① Самойлов Н. 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к/Под ред. С. М. Иванова, Б. Н. Мельниченко. СПб., 2000.

斯在元代还有“斡罗斯”“兀罗思”“兀鲁思”“阿罗思”等名称。从时间上讲,最早记载俄罗斯的是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俄罗斯被称为“斡鲁速惕”。但在元代以前,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对中亚以西国家和民族的记载极其稀少,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斯拉夫民族。有学者认为“里海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花刺子模和阿拉伯商人充当着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中介”^①。《蒙古秘史》和《元史》中的这些记载,说明中俄双方的直接交往始于元代,并且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正是在元代,“俄罗斯”一词经蒙古语转译成汉语。

也正是这个时候,中国才以一个与罗斯同时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俄国古老的编年史中。成书于14世纪末的《索菲亚6903年第二编年史》第一次提到了中国。1466—1472年间,一位罗斯商人,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旅行家,名叫阿法纳西·尼基京(Афанасий Никитин),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游记——《三海航行记》。阿法纳西·尼基京由海路向东最远到达了印度。在那里,他听说离印度不远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还听说“那里制造瓷器,东西都很便宜”^②。有学者认为,12世纪的史诗《伊格尔远征记》中的“希诺瓦”(Хинова)就是指中国。也有人认为,这并非特指中国,很可能是对东方民族的统称,或者就是对匈奴人的称谓。

在早期俄文文献中,对中国的称呼实际上不止 Китай 一种,而是三种,第二种是 Хина,第三种是 Никан。关于 Китай 的来历,学术界已经有了定论,其音为“契丹”,最初是中亚民族对西辽的称呼,而后逐渐将其用来指称中国。在突厥语系及蒙古语当中,都是用 Китай 或与之拼写相近的词汇来表示中国,均采用“契丹”的译音。由于俄罗斯与中亚、蒙古民族在地缘和文化上存在久远而密切的联系,“Китай”一词便经由突厥语系和蒙古语进入了俄文。另外一个名称是 Хина,是“秦”的译音,与西文中的 Sin 一致。最早使用“秦”来指称中国的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后来西方语言中才有了这个词。在当时俄罗斯人的思维中,Китай 和 Хина 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地域或空间概念并无明显差异,都是对中国的称呼,不同的只是词源以及与之相关的修辞色彩。Никан 一词音译为“尼堪”,是满族人

① Горбачева З. И. Первые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цев о России//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Вып. 2. М., 1961.

②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15.

对汉人的称呼,俄国人有时也用来指称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人。对于在西文中用来表示中国南部的“蛮子”一词,俄文使用得比较少。这说明,俄罗斯人自认识中国以来,并没有像早期一些欧洲学者那样将“蛮子”和契丹当作两个国家。从最初中国人知道“俄罗斯”的存在,到俄罗斯人获悉中国的消息,双方的沟通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以其他民族为中介实现的。关于俄文中“中国”的词源背景,从18世纪就已经被学者关注。1756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约·费舍尔(И. Э. Фишер, 1697—1771)发表《论中国国名及皇帝尊号》一文,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专门探讨了俄文中“中国”的词源。^①

第二节 蒙古民族的中介作用

有明一代,退居塞外的蒙古各部内讧不断,并不时与明廷发生冲突。此时罗斯人也正处在摆脱金帐汗国控制进而实现民族独立的进程中。1380年的库里科沃战役大大削弱了金帐汗国对罗斯的控制力,1480年的乌格拉河战役则使罗斯彻底摆脱了蒙古的统治。到瓦西里三世(Василий III, 1479—1533)时期,东北罗斯终于实现了统一。自此以后,其与蒙古人的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伊凡四世(Иван IV, 1530—1584)在位期间,俄国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其势力延伸至乌拉尔山脉。俄国人很快与在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及叶尼塞河流域世代游牧的蒙古部族相遇。

俄国统治者利用蒙古部族之间为争夺牧场、牧民和牲畜而产生的矛盾,挑唆其内讧,从而达到削弱蒙古人势力并占领其土地的目的;当使用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其阴谋时,他们便向蒙古部族派出使节,拉拢和诱惑蒙古人首领“效忠”俄国沙皇,同时探听有关中国的情报,为进一步向东拓展创造条件。

俄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源于这个神秘而富饶的国家所带来的诱惑。得益于新航路的开通,欧洲与中国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然而遥远的距离以及海路的凶险使得欧洲人产生了循着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当年的足迹寻找更为安全、便捷前往中

^① Фишер И. Э.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разных имен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о ханских титулах//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Октябрь, СПб., 1756. С.311—327.

国的陆路通道的想法。比如,1615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派遣使节托马斯·史密斯前往莫斯科,“商谈商人贸易之事,希望准许英国客商自由贸易,准许他们经过莫斯科国土前往波斯,并探明中国情况”^①;1616年,英国使臣约翰·麦里克再次恳请“准许英国客商经鄂毕河由海上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②。俄国人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没有给欧洲人这样的机会,而是利用其地缘优势,希望能先行开通并垄断这条利益巨大的商业通道,进而在西方和东方的贸易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然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俄国人必须经停厄鲁特蒙古和阿勒坦汗的属地。

厄鲁特蒙古在明代被称为瓦剌,早在15世纪就已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世代生活在中国西北边疆。1604年,俄国殖民者在厄鲁特蒙古属地建立托木斯克,作为其渗透和侵略的基地。

阿勒坦汗名义上是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的部属,当时阿勒坦汗统辖着喀尔喀蒙古西北地区和厄鲁特蒙古(1623年,厄鲁特蒙古摆脱了阿勒坦汗的统治——笔者)。阿勒坦汗部的强大势力及其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得俄国人不得不重视与之发展关系,不断派出使团到阿勒坦汗处活动。俄国使节们的使命主要有四个,一是诱导蒙古王公效忠沙皇,二是越界征收实物税,三是规范双方贸易,四是寻求通过阿勒坦汗的辖地前往中国的可能。^③

1608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向阿勒坦汗派出了以别洛格洛夫(И. Белоголов)为首的使团。因为当时硕垒乌巴什琿台吉正与厄鲁特蒙古打仗,别洛格洛夫一行在吉尔吉斯人游牧地度过了整个冬天后不得不折返。然而他们还是通过吉尔吉斯人探听到有关阿勒坦汗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探听到了前往中国的距离,“由阿勒坦皇帝(即阿勒坦汗——笔者)那里到中国要走三个月……有个中国君主,据说他的城堡是石筑的,城里庭院的风格与俄国相似,庭院里的厅堂是石筑的,摆设富丽堂皇。那里的人很多,都比阿勒坦皇帝的人强悍。中国君主皇宫中的殿堂也是石筑的。城里有君主的一些庙宇,庙里钟声洪亮,庙的屋顶上没有十字架,至于庙里信仰什么宗教,他们不清楚。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俄国相似。中国君主的武

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 第1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1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Чимитдоржиева Л. Ш. Русские посольства к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Алтан-ханам XVII в. Улан-Удэ, 2006. С. 55-107.

器是火器。据说常有人由各地到他那里去做买卖,他们平时穿的都是绣金的衣服,他们把各地各种贵重装饰品运到他那里”^①。尽管别洛格洛夫带回来的信息很简单,却清楚地反映了俄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所在,其中对中国城池、宗教、军事、物产、商业的勾勒有其独特的价值。自此,俄国人知道中国并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国度,通过蒙古人的领地,他们完全有可能到达那个神秘而富裕的国家。

1616年,俄国向厄鲁特蒙古与阿勒坦汗同时派出使团。受命出使厄鲁特蒙古的托米拉·彼得罗夫(Т. Петров)和伊·库尼津(И. Куницын)在卡尔梅克大台吉巴加蒂尔处见到了来此征收实物贡赋的阿勒坦汗的人和中国人,向他们探听有关中国及阿勒坦汗部的情况。他们的问题包括“中国有多大,有多少人,同哪些君主和国家有来往并保持友好,他们信仰什么宗教”。蒙古人和中国人告诉他们:“阿勒坦王子所信的宗教、所用的文字和语言都同中国一样。现在他们正在引导卡尔梅克人也信仰自己的宗教,并且传授本国的文字。阿勒坦皇帝和中国皇帝已经引导许多卡尔梅克人信仰自己的宗教,按照自己的宗教习俗,禁止他们吃马肉、喝马奶。学会了他们的文字的大台吉们和他们的妻子,现在不吃马肉,不喝马奶。阿勒坦王子和中国人的宗教仪式是这样的:他们按自己的宗教信仰,穿着绸缎,向鬼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一只手拿着小铃,另一只手拿个小板鼓,面前放一本经书,念经一个来小时,同时两手敲着小铃和板鼓,下跪着地磕头。在中国,有一座用砖砌的城,有一条大河,河的名称说不上来,大小船只载着货物从其他许多汗国由这条河驶来。中国盛产粮食。他们常把花缎、素缎和丝绒作为皇帝的礼品运送给台吉们。其他汗国的人,也常到他们那里去,估计黑阿拉伯汗国的人也常去。在他们中国和在阿勒坦皇帝那里,除了红黄二色粗呢以外,并没有什么贵重的饰物。据说从他们到过的那些台吉那里,一路游牧到中国,大约要走一个月,由托博尔斯克去,要走三个月。据说中国的钟声音很响,一日三次,是在清真寺做祷告的时候敲的。”^②至于这两位使节是否真的见到了中国人,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从他们获得的信息看,似乎是经由蒙古人介绍的,道听途说的色彩浓厚。

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8页。

② 同上,第65页。

丘缅涅茨(В. Тюменец)使团的使命是劝诱阿勒坦汗臣服俄国,同时探听前往中国的路线。这一次俄国使团顺利抵达了阿勒坦汗的大帐,遇到了中国人,并向他们打听到“他们的国家叫中国,有自己的皇帝,中国王朝的名字叫大明。而中国位于海湾边上,城是砖砌的,而骑马环城一周需要十天时间。中国打仗用火绳枪和大炮。常有大帆船来中国,船上都是商人,每艘船可载二三百人。中国人穿着布哈拉样式的衣服。从金皇帝(即阿勒坦汗)那里到中国骑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路上没有大河大江,地势平坦,没有山”^①。

为了了解俄国的情况,阿勒坦汗派两个人随同俄国来使到莫斯科。觐见沙皇时,两位蒙古使节在介绍自己的领地及首领的同时,也介绍了中国的情况:“阿勒坦皇帝的使臣们还说,在阿勒坦国附近有个中国,由阿勒坦皇帝那里走到该国,走得慢要六个礼拜,走得快要四个礼拜……中国的城是砖砌的……城中间有条大河……中国的货物有:绸、丝绒、花缎。中国出产金、银……中国种植的谷物很多,有小麦、大麦、燕麦、黍。中国的兵器是弓箭,但没有大炮和火绳枪。据说中国很大。”^②

1618年,又有一个俄国使团来到阿勒坦汗的驻地,首领是彼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然而他们的目的地却是遥远的中国,使命是与中华帝国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阿勒坦汗为俄国人提供了大车和向导。这些向导在长期与俄国人的交往中逐渐学会了俄语,不仅引导彼特林使团到达了北京,而且还充当俄国人和中国人的翻译。由于没带贡品,彼特林未能见到大明皇帝,在驿馆住了四天后离开北京,在张家口停留了约一个月,于10月11日踏上归途。1619年春天,彼特林使团回到托木斯克;同年9月,他向沙皇觐呈一份报告,题为“中国、腊宾(指西藏——笔者)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诸国、大鄂毕河、河流和道路一览”。此外,他还呈上一张中国地图以及明万历皇帝的国书。彼特林的地图至今未被发现。由于没人能够翻译中国皇帝的国书,这份国书在俄外务衙门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675年斯帕法里(Н. Г. Спафарий, 1625—1708)出使中国途经托博尔斯克时才由一名军士译出大意。^③尽管彼特林出使中国没有取得实际

① Фишер И. Э.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сам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ибири до завоевания сей земли российским оружием. СПб., 1774. С.260-261.

②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4页。

③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16-17.

成效,未能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但他开辟了前人未知的经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前往中国的陆路通道。

1634年由图哈切夫斯基(Я. Тухачевский)率领的俄国使团来到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的驻地,要求他效忠沙皇,但遭到了拒绝。在图哈切夫斯基留下的报告中,有他探听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大明皇帝的城池都是用石头建的,人们心地善良,除了蒙古,再没有这么大的国家了。不允许阿勒坦汗的蒙古人越过边境城市进行贸易,大明皇帝不是蒙古人。”与此同时,俄国使节还向阿勒坦汗询问了一些中国的情况:“他们的先民是谁?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的土地生长什么作物?有什么物产?什么国家将什么商品从水旱两路运到这个国家?他们向什么国家卖出什么商品?路程有多远?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少?跟谁在打仗?”阿勒坦汗回答道:“大明皇帝住在汗八里城,这个城市离中国的边境城市很远,离蒙古的城市也很远。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边境城市去办任何事,我们蒙古人也只有大人物才可以去边境城市,小人物是去不了的……我要派一些可以信任的贤良之人前往中国的城市和其他蒙古大帐,让他们去打听,一旦获悉实情,将写信告诉国君(这里指沙皇——笔者)。”^①

1636年,阿勒坦汗的使节达尔罕·康津(Тархан Конзин)对俄国外务衙门通译普·弗拉斯科伊(Прокофey Враской)说,他去过中国的张家口,并向俄国人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关于张家口的城市建筑和防卫,谈话记录中写道:“那座城市是用石头和砖块砌的,有城楼和城门。铁栅栏的样式和莫斯科的相似。这座城市有多大,有多少人,这些他都不知道,因为不让他们在城里游逛。只让他们中的少数人进城,并且由翻译送他们到客栈。城门两旁站着持火绳枪的卫兵,他们的火绳枪带有点火杆,这种火绳枪是他们国家自己制造的。城里没有大型火炮,只有小型火炮,就像他达尔罕·康津在托木斯克见到的那种。”达尔罕·康津的描述基本上还是符合事实的。俄国人非常关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达尔罕·康津介绍道:“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向画在纸上的神像祈祷。有一些神像是用金、银、铜、铁铸造的,其容貌如人,同真人一样高,有的比人高,有的身高约达五俄丈^②、十俄丈,有的更高。人们戴着帽子

① Чимитдоржиева Л. Ш. Русские посольства к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Алтан-ханам XVII в. Улан-Удэ, 2006. С. 105.

② 旧俄长度单位,1俄丈等于3俄尺或7英尺或2.13米。